

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态势

周新国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实践在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伴随着这股媒体、网络带来的口述史的热潮,“口述历史”的书刊发行或刊载成为时尚。当然,构建中国口述史学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浩大的系统文化工程。从研究方法来说,它涉及多个学科;从内容上看,它包括多种领域;从类型来说,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社会现象,无一不是口述历史的对象。针对口述史研究的现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中国大陆 口述历史

周新国、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扬州大学历史学教授 225002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实践朝着成熟的方向迈进。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发展基础上,在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以下概括介绍有关口述史学术会议、口述史的实践成果和口述史的理论探讨等三方面问题。

一、学术会议

1. 首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4 年 12 月 10-12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科联、扬州大学、《当代四川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召开。80 多位来自全国政协、教育部、新闻出版、科研机构及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也

出席这次大会、其中既有国内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当今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专家。

本次论坛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交流了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与建设深入探讨,讨论了口述历史的规范、标准、原则。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推动了大陆口述历史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2. 第二届中华口述史学术讨论会

2006 年 11 月 10-12 日,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江汉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次东亚史料编纂机关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华口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江汉大学举行。著名学者华中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在民国的开创

——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的意义

束 贇

内容提要 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创建,往往会追溯至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一书。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勾勒出了整个政治科学体系粗朴的大纲。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正如邓初民所言“任何科学都成为与实践不可分的‘契机’而和实践统一在某种方式上,政治科学尤然”。本文试图探究以邓初民著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产生之契机,并尝试借此回到当时的场景之中,分析成书的背景、时代对政治学的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当时学术独立与经世致用争论中的多重角色。

关键词 邓初民 《政治科学大纲》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

束 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433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时局与“政治学原理”发展之契机

1929年,任教于暨南大学等校的邓初民在上海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是《国家论之基础知识》,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二是《政治科学大纲》由昆仑书店出版。这两本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前者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意图厘清国家之本质^[1];后者更是勾勒出了整个政治科学体系粗朴的大纲。与力图风靡一时的政治思潮、主义不同的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都是试图探讨原理、厘清概念、设立体系。因此,当后来人们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之时,往往会追溯至《政治科学大纲》一书^[2]。但是,这本著作的出现,或者说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学的开始,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正如邓初民所言“任何科学都成为与实践不可分的‘契机’而和实践统一在某种方式上,政治科学尤然”^[3]。若要知晓邓初民的政治学产生之契机,我们就必须尝试着回到当时的场景之中。

1929年,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种特殊首先表现在大量涌现的像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一类的以阐述“政治学原理”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上,这一轮编写政治学原理书籍的热潮以1923年张慰慈编订《政治学大纲》为起始,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但最为突出的是1929年至1932年,在短短四年间,出版了30本左右的此类著作,囊括各种流派。(见表1)^[4]

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

刘 超

内容提要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成长的初始阶段,清华因与哥大的特殊渊源而扮演了重要角色。蒋廷黻在中国首开原创性的近代史研究,并以近代史为抓手,率先推动新史学的体制化。在罗家伦、蒋廷黻等人推动下,清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崛起,该校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策源地,并赢得了国际声誉。其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孕育了一批力作;优质的人才培养为国内外学术机构输送了大批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其在公共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亦贡献卓著。邵循正、郭廷以以及费正清等后起之秀,继承并发展了罗、蒋的学术传统,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人物,对该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 清华学人群 中国近代史研究 蒋廷黻 邵循正 费正清

刘 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 100084

新史学的国际互动:从哥大到清华

一般地说,清华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正式起步,当始于罗家伦。罗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较系统的训练和新史学的理念。罗与蒋廷黻在哥大同学两年,同在史学系听课。当时的哥大是全球“新史学”的中心。蒋廷黻于1919-1923年在哥大读博士,罗则于1921年转入哥大研究院。是时,二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有讨论。此时鲁宾逊虽已离开哥大,但他之前已在该校任教25年,其学行和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该校的史学教研路向和风格。他培养的大批学生在美国各大学、中学任教;其大量友徒均成为史坛名家。鲁宾逊的影响亦随风影行。鲁宾逊明确主张史学“为

现实政治服务”,其学术理念不仅风行学界,且被当局所重,影响深远。二人在此环境中自然不可能不受其流风余韵之濡染。蒋在哥大先后听过多位名师授课,它们大都对蒋的毕生学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罗家伦很早就心怀夙愿,欲在中国缔造一学术中心。为了寻找这个理想的近代史研究中心,他费尽苦心。1925年8月,游学德国的罗致函蔡元培说他本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颇有兴味,“将来为中国近代史之著述,北京更为材料之策源地”,故欲回母校北大任教^①。游学欧洲时,他还曾数度与顾颉刚讨论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急欲推动相关研究。归国到东南大学任教后,他又致函顾:“弟之研究,非有大宗经费搜集资料不行。……弟于中国近代史留心以来,不敢谓有

二十世纪 30 年代国共两党的工厂法

衡芳珍

内容提要 在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由于所处政治地位及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同,执行了不同的劳工政策,国民党倡导“劳资协调”,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此时两党的工厂法在适用范围、工作时间、童工女工保护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工厂法》体现自由雇佣原则,共产党《劳动法》强制性突出,两党工厂法都遭到了非议和批评,《工厂法》主要受到资方的批评,《劳动法》则遭到党内务实派的抵制和非议。此时的工厂法未能处理好移植和本土条件的结合。

关键词 民国 共产党 国民党 工厂法

衡芳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610064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的革命同盟正式破裂,随后中国进入了十年内战时期。在此时期内,国共两党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不同,再加上国际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劳工理论,执行了不同的劳工政策,并且都制定了工厂法以保护工人的合法权利,两党的工厂法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也有很大的不同,研究此时两党的工厂立法,加以对比,可以丰富民国史研究,也可以对现时的工厂立法有所借鉴。

一、两党的劳工政策不同

劳工政策是劳工立法的指针,因此首先要了解此是两党的劳工政策。虽然两党都声称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们的劳工政策截然不同,国民党倡导“劳资协调”,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这种差异源于两党对国情的不同认识,也和国际因素紧密相关,并直接影响此时两党工厂法的内容。

在大革命时期,两党都把工人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试图依靠工人阶级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随后的革命中,工人阶级推动了革命的前进,为北伐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证明了他们的力量。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激进和“左”的现象^[1],此后国民党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限制工人运动,共产党继续推动工人革命,劳工政策差异凸显,随着大革命失败,两党走向对立,劳工政策不同日益明显。

1. 国民党倡导“劳资协调”,鼓励工人发展生产。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亲近欧美,反对共产主义等需要,采取一些列措施安抚工人,特别为了适应宣传需要,构建了一套工人要增加生产,劳资要协调的理论。

首先,中国不存在阶级斗争,全国都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分大贫和小贫罢了,这种提法首创于孙中山。“中国大家多是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

计划政治的体现与实施

——1930年代广西县政的制定、实施和考核

张爱华

内容提要 1930年代广西省府对全省政务实行全面统筹规划和监督,下级政府的施政被严格限定在省府规定的范围之内,省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以量化的方式进行考核。这些施政特征表明30年代的广西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政治”,县级和乡镇村街政府仅是政务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并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目前学界关于这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尚乏对县政考核和基层干部管理这一问题的深入全面探讨。

关键词 广西 县政 考核

张爱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430007

县级政权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得到强化。县政考核是1930年代广西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县政奖惩,执掌广西省长19年之久的黄旭初有过这样的表述:“以前县政办的好的,获奖的只有县长,办的坏的,受罚的亦只有县长,因为奖和惩都没有到属员身上,所以大家就不肯负责任。以后县政办的有无成绩,县长和主管科科长、科员、办事员,其奖和惩都是连带的,责任分明,赏罚公道,各级人员方能负责办事。”^[1]

1930年代的广西下级政府施政的依据是省府每年颁布的县政实施准则,县政考核主要考核下级政府对省府颁布事项的办理程度和效果,县政考核的依据是下级政府填写的各种施政报告表、视察人员和省级要员的视察报告,根据这些省府对包括乡镇村街在内的下级政府的政绩进行量化考核。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广西施政的过程和县政考核的过程、效

果进行考察,以期审视这一时期广西基层政府运作的状况和广西的施政特色。

一、县政设施准则的制定

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县设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事务。”^[2]其后,国民政府虽然试图划分省县行政事务,但在执行过程中县府所承办政务都由省府委派,极少存在县地方自治事务。1931年广西当局颁布的《广西各县组织大纲》第五条规定:“县设县政府,于省政府指挥监督之下,处理国家及省之行政事务,并督促推进县地方自治事务。”^[3]根据广西的规定,县所承办政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和省行政事务,一类是地方自治事务。1933年4月颁布的《广西各县组织大纲》中对省行政事务和县自治事务做出了划分,《大纲》规定:“县之事务属于省者暂

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 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孙长斌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中国产生了民主革命所必需的现代经济。中国现代经济因素的成长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军阀制度间的严重对立;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意识的觉醒,塑造了民主革命的阶级主体。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意识影响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市民在内的所有人群,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独立的运动,而是演变成为工人、农民、市民多阶层参加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为取向的共同政治运动。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也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和革命意识。

关键词 一战 现代经济 民主革命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孙长斌,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2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启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革命的总体形势,尤其是客观形势是充分的,或者说已经达到了革命爆发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这种客观形势的总和就构成了革命的内外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及战后世界形势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正是一战及战后带给中国经济的这种新变化,为中国民主革命创造了新的革命因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

一、一战及战后中国经济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工业经济大致经历了外国资本企业在华的出现、清政府创办的官营和官私合营企业和民营资本企业发展三个阶段。以一战为标志,中国现代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跃升到具有初步体系的现代工业阶段,形成新一次的工业化浪潮。

1. 一战对中国工业经济的显著影响

第一,一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在华投资整体下降,为民族资本的增长创造了发展空间。一战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10YJA71006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形态研究”(11YJA710047)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苏教社政[2010]2号)的阶段性成果。

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易人风波

顾建娣

内容提要 太平天国平定后,清政府试图从湘淮集团手中收回两江地区。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调李鸿章外出作战,以吴棠替署江督。旨令曾国藩、李鸿章和吴棠三人函商。曾国藩和李鸿章并不与吴棠商量就径直复奏,表示李鸿章无法调离。措辞巧妙,无法辩驳。吴棠无法署理,最后也被调离江北。湘淮集团把持两江总督职位四十多年。两江总督职位之争是满清政府和汉族官僚、中央和地方之间争夺地方事权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两江总督 吴棠 曾国藩 李鸿章 湘淮集团

顾建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00006

三江之地,既是清政府的财赋之区,又是剿捻湘淮军的主要饷源。同治四年江督易人之议,引起朝野双方的激烈争辩,心计之深,设词之巧,更是耐人寻味。

现有的关于清政府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关系的论著很多,但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论述。关于两江总督职位之争,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旨在透过这一事件,揭示咸同时期满清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湘淮集团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政治关系。

一

同治四年九月初十日,湘军攻陷江宁一年零三个月,清政府乘钦差大臣曾国藩在徐州督兵剿捻之机,下旨更换江督。谕旨先肯定曾国藩对赖文光捻军的用兵布置,为防止曾国藩无法兼顾的张宗禹捻军“西趋”、“北扰”,必须派兵驻扎豫省。谕旨称:

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

派。该处居天下之中,空虚可虑。因思李鸿章谋勇素著,且年力壮盛,可以亲历行间。著即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将豫西股匪迅图扑灭,兼顾山陕门户。俾西路张总愚等股匪,不至阑入,保全完善。一俟西路剿匪事竣,即行驰回两江总督署任。似此东西两路,通力合作,曾国藩既无西顾之忧,得以专注东路,则剿办更易得手。……

至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吴棠办事认真,且在清淮驻守有年,于军务亦能整顿。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其漕运总督印务,即交与李宗羲暂行署理。江苏巡抚与洋人交涉,事件颇多。丁日昌籍隶粤东,熟悉洋务,以之署理江苏巡抚,可期胜任。

曾国藩等接奉此旨,彼此函商。如果意见相同,即著迅速覆奏,再明降谕旨,分飭遵行。将此

林则徐治理刘河、白茆河述论

张 晖 范金民

内容提要 治水在林则徐一生的政绩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道光十四年疏浚刘河、白茆河更是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一件大事。与前人相比,林则徐治水在经费的筹措、方案的选择等方面都颇费周折。工程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只是由于投入的规模有限和天时等原因,收效不可能长久。

关键词 林则徐 治水 刘河 白茆河

张 晖,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19 世纪,中国与欧洲、亚洲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也遭遇了经济、社会的危机,国内学者一般称为“道光萧条”^[1]——气候急剧变化,水旱灾害频发,农业屡岁歉收,国家财政拮据,社会经济持续衰退。面对危机,中国的士大夫仍以传统的方法应对,勤修农田水利,希望用地利来弥补天时的不足。林则徐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林则徐四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治水占去了其大部分时间。东南钱塘江,西北伊犁河,北黄河,南闽江,都留下了他治水的足迹。

有关林则徐治水的论著已有不少,如王质彬的《林则徐治黄——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2],介绍了林则徐治理黄河的主要活动及其成就;汪志国的《林则徐治水述论》^[3],总结了林则徐一生治水的业绩及其特点;周志斌的《林则徐江苏治水》^[4],叙述了林则徐在江苏一省治水的实践及其思想。但是这些论文既没有清晰交代林则徐治水的历史背景,也没有

与前人的治水活动作比较,林则徐治水的业绩如何评价,更殊少提及。

明清时期,国家依江南为腹心,江南又赖水利为命脉,所以太湖流域的治理历来受到朝廷的重视,留下的文献记载也颇为丰富。林则徐疏浚刘河、白茆河是清代前期太湖流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治理,其治理的背景、经费的筹措、施工的方案,与前人的治理相比,都有独特之处,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诚然,林则徐治水的成效虽然显著,却也不宜做过高的评价,治水理论、技术的局限,以及气候变迁、环境恶化的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局部治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其治水功效不可能长久。

一、治水背景

太湖流域是一个碟形盆地,四周高、中心低,湖水以涌涨的方式东流入海,因此下游河道的排水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项目批准号:10&ZD069)的阶段性成果。